

多灾之年需要怎样的社会心态?

【学者视线之章立凡专栏】

我承认,进入2008,连我这样的人都变得有点“愤”,按捺不住想骂人的冲动,我这是怎么了?

不但是我,还有我周围的人,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上网的与不上网的,“左愤”与“右愤”……一语不合便恶言相向,口水战一直没停过。有话不能好好说,中国人这是怎么了?

我曾用“坐过山车”来形容国人今年的情绪:雪灾压垮了春运,通胀伴随着股灾,火车相撞纱帽不丢,疫病流行无人请辞,连去年忽悠出的一只“纸老虎”,至今还活蹦乱跳……这林林总总不可理喻的怪象,都被一场8级大地震暂时覆盖。惨烈的灾害画面令国人震惊,继之以大悲恸大救

难,人性的善良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在大地的颤抖中被激活了。

执政党领导人对灾害迅速作出反应,表现不俗,得分不少。举国降半旗,向灾害中遇难的普通民众致哀,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虽有民间的推动和秘鲁的示范,但毕竟是在表示执政理念的转变。如能就此机会推进体制改革,自然是个“坏事变好事”的机会;可惜体制惯性巨大,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欲速不达;对某些政府部门灾前灾后的作为与不作为,问责声也是此起彼伏。

中国是一个讲究“导向”的国家,言论视听一贯“中规中矩”。从肃穆的哀悼场合爆出“加油”声起,像我这样的国家,言论视听一贯“中规中矩”。从肃穆的哀悼场合爆出“加油”声起,像我这样的

运,也不想救灾期间多批评政府。自此往后,从“跑跑”到“跳跳”,从“含泪劝告”到“做鬼幸福”,种种怪论无不触及人伦底线,惹来嘘声一片。

令人奇怪的是,某些一向宣传“和谐社会”的媒体,最近不大讲和谐了,对不同观点的口诛笔伐,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网络暴民”也日益相互对立。更可怪者,连总理正面肯定的普世价值,都有人在恶意攻击。

“以人为本”是不是普世价值?我想应该是,否则无法解释各友好国家对地震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便是强调“中国特色”,也不能“丧事当喜事办”,这毕竟超越了人伦底线。

地震浩劫哀痛未平,奥运盛会开幕在即,中国人将何以自处?我认为尊严是第一位

的。虽然无法摆脱悲情,但历史上的中国曾是礼仪之邦,要赢得尊严和别人的尊重,就得以庄重自强的气度礼尚往来。

无须聚众煽情的民族主义,中国人本来就是爱国的;摒弃矫情做作的歌功颂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停止无聊无赖的诽谤辱骂,劫难后的心灵需要净化。对地震及奥运的宣传也应“以人为本”,能否改革一下八股式的老套路,使之贴近人性和便于接受?

以平和的心态反省自己,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别人,以友好的心态迎接客人;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做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与文明世界和平共处。我亲爱的同胞们,做到这些不太难吧?

(作者系近代史学者,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等著作问世)

“华南虎”为什么快不过“范跑跑”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针对郝劲松要求向社会公布虎照调查结果的申请,国家林业局称原则上他们将于6月23日给予答复。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今天,虎照调查结果将接受公众质询。也是在今天,郝劲松因为对国家林业局的回复很不满意,“也不符合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他将以“信息公开申请人”的身份,分别在北京和西安起诉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林业厅。

发生于去年10月的“华南虎照”事件,至今已几个月了。按计划,今天终于要“真相”大白了。结果无外乎有两种:虎照是假的,有关当事人已经或将要受到惩罚,周正龙是一个农民,既不可以双开,也不便双规,更不会下岗,对于他,损失的除了一点个人“声誉”外,其实也没有什么。

如果“虎照”真是假的,那么很有可能是他“个人”所为,有关部门和领导是被他蒙蔽了,也就是,“虎照门”责任主要得由他来扛。另外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虎照”是真的。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及时公布,是“本着对当事人,对公众、对事实真相负责”的态度。然而,对于深思熟虑、已经做好了各种舆论应急预案的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林业厅来说,无论什么样的结论,都必然要承受公众的进一步质疑和批评。是否第三方调查?结果是否可信?如何问责?损失的政府信誉谁来理单等等。也就是说,相对于周正龙个人来说,这两个部门,再大的“成功”(比如,虎照确是真的)也是失败。

其实,所谓的“真相”现在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华南虎照”何以会成为“范跑跑”事件。

“范跑跑”的主管部门,顶着“广大网民”的巨大压力,端掉了“范跑跑”的教师饭碗。如果说对范美忠的处理很突兀的话,虎照事件一拖再拖,则让人感到无奈。前者的突兀,不仅在时间上让人感到快得有些不可接受,在程序上也存在着瑕疵。后者则在舆论的波峰浪谷里“按部就班”,慢得让人愤怒、郁闷。同样是公共事件,为什么事发几个月后虎照才有一个初步的“官方”结论,而教育主管部门处分“范跑跑”之雷厉风行却让人错愕。“华南虎”跑不过“范跑跑”,是因为前者的过慢让我们对后者的过快不适应,还是后者的过快让我们对“华南虎照”迟迟得不到处理而更加不满呢?

两件事情之所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除了属于不同的职能部门之外,更主要的是,“范跑跑”事件相对单纯。直接当事人就范美忠一个而已,所以处理起来阻力较小。而虎照事件中,虽然浮在表面只是“周正龙”一人,但其背后却牵涉面甚广,更主要的是,关联到部门利益和政府形象。所以,在处理的节奏上,一快一慢,对比鲜明。

这样一看,如此“选择性执法”,就毫不奇怪了。有些执法主体,一旦遇到强势部门、集团利益时,就会非常“慎重”,甚至甘做鸵鸟——“80后厅官”不就不声不响没有下文了吗?而在碰到“范美忠”这样的“异己”时,别说你有错在身,就是没有大错,也不惜“错杀”以谢国民。选择性执法时,法律的适用弹性十足。而这,恐怕是最让人忧心的。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停开一半公车影响会有多大?

■今日视点

有关部门日前印发《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深入开展节约能源活动的通知》,提出确保实现今年公务用车油耗降低20%、办公区节电5%的目标。23日起,北京50%公车将停驶。报道中还提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在京单位共有车辆约2.28万辆,23日起,这些车辆将分批停驶限行。从6月23日至7月19日,每日停驶50%;7月20日至9月30日,按北京市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规定执行;在6月23日至9月30日期间,中央和国家机关所有的黄标车将全部停驶。

(6月21日新华网)我国的公车到底是不是

多过头了?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公车?长期以来,舆论虽然屡屡发出类似的质疑,公车每年的巨大消费额也一次次刺激着我们的眼球,但对这些问题,我们似乎没有能力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谁也不知道,如果公车大规模停开,到底会对政府的运转产生多大的影响。此次北京停开一半公车的决定,恰好给了我们寻找准确答案的契机。

我愿意相信,有关部门发出通知之前,是准确估量了日常公务用车的需求,也考虑到,即使一半公车停开,政府部门的日常运转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否则的话,影响如此广泛的通知是不会出台的。事实上,2006年11月,中非合作高峰论坛于北京举行期间,

北京市为了给大会让路,曾经作出了停开部分公车的决定。事实证明,论坛期间,北京市各个政府部门秩序井然,运转流畅,并未因部分公车停开而影响公务效率。在那次实践之后,舆论对据此削减公车数量的呼吁就一直未绝。遗憾的是,北京市有关部门始终未能站出来正面回应。此次北京市再次决定停开一半公车,可以说是又给了我们审视公车数量合理性的最好契机。

美中不足的是,北京市此次停开一半公车,虽然力度远比中非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大,但同样未能走出“目的依附”的怪圈——停开一半公车是为了“深入开展节约节电活动”,而不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公车。也正因为这个目的

依附性,决定了此次停开一半公车依然不是常态性的举措。新闻告诉我们,活动的时间只是6月23日至9月30日。活动结束后,这批停开的公车很有可能再次上路,公车过多问题依然无解。

今天起,北京的一半公车将停止上路,但我相信,没有了一半公车的北京市各政府部门,其公务将照常展开,运转将一如既往地顺畅。这事实上也在告诉我们,在经历了几次停开部分公车的实践之后,是时候将“公车数量合理性”的问题放到台面上来了,是时候为了减少公车数量而停开了。停开一半公车,政府运行却依然有效,那么,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让这一半的公车再重新上路。(尹之)

【读者挑刺】

1.读者董小姐等:6月20日A16版《高压氧舱起火烧死病人》第二段倒数第三行中“陈春荣”应为“陈春莹”。编辑张旻,校对贺希皓。

2.读者蒋华军等:6月18日A25版《央视女主播炒股炒成千万富姐》左下图“周璇锋生活照”实际上是央视主持人梦桐的照片。编辑冯晓飞。

3.读者王女士等:6月18日A21版《何时开始基金定投最好?》第一段第二行中“出口留学”应为“出国留学”。编辑张海荣,校对陈维琴。

防止“搭车涨价”是一种考验

■热点纵论

6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成品油和电力价格调整的各项措施,严禁商品趁机搭车涨价,变相涨价。

(6月22日《西安晚报》)去年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的“搭车涨价”令人至今心有余悸,此番油、电价格上涨的消息刚刚传出,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搭车涨价”的苗头。基于这样的背景,两部

委严禁“搭车涨价”无疑十分及时。不过,首先要明确什么样的涨价行为属于“搭车涨价”,这就必须提供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使人们看清楚,什么样的商品可能因油、电价格上调而出现正常波动,以及什么样的上涨纯粹是“趁火打劫”。只有明确了“搭车涨价”的范畴,禁令本身才能觅得一个稳固的着力点。

巡查,以及鼓励民众实施监督等等。显而易见,只有将禁令细分为具体的实施方案,才能释放出其应有的威力。此外,由于油、电产业在产业链中的特殊地位,包括交通运输、餐饮服务受其影响的产业实在太多,因此,在加强对特殊群体财政补贴之余,更多地还是要靠清理整顿收费、加大规费减免力度等举措来实现成本减负。而如何扩大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范围,以及确保各种补贴能够及时足额的发放,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赵志疆)

明“搭车涨价”的范畴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有效制止这样的行为。比如,如何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市场检测与价格

可否让评论员直接约见官员?

【中国日记之童大煊专栏】

6月20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间虽短但寓意深刻,总书记对于网络这个新兴主流信息渠道以及网民这个特别公民群体的开放态度,令海内外印象深刻。

在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同志交谈时,胡锦涛总书记着重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讲了5点意见,其中谈到“培养造就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名评论员”赫然在目。上海评论员鲁宁先生据此分析:若不出所料,接下来,不只是人民日报,包括各级党报(尤其是省市两级),都会不同程度地重视和强化新闻评论,这对拓展当下中国新闻评论的“空间和内容”十分有益。

我赞成鲁宁的判断,并且认为,内地的新闻评论有可能从此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过去的价值启蒙阶段更多地向事实分析阶段转变,由政府、官员与评论员“背靠背”的阶段更多地向“面对面”阶段转变,由政策批评向更多的政策分析和政策推动的阶段转变。由此,评论将有可能更加直接地影响政策,影响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将来,成熟的、有公信力的时事评论员约见官员的场景,在内地可能也将逐渐显现。

前些日子,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开始走上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平台,开启内地第一个直接由新闻发言人向公众“问政”的节目探索。在即将开播的中央教育台“问教”栏目中,王旭明将亲自走上主持人的前台,与嘉宾们一道探讨具体的教育政策。“问教”栏目将成为教育部解释、宣传、探讨教育政策并问策于民的常规节目。

当然,这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一样,仍然是“官员走下来”的模式;成熟的时事评论制度,还应该要有“评论员走上去”,走到政策与官员中间的模式。

前些日子,在与新闻出版总署一位官员聊天时,该官员透露,他们对“评论记者”一感兴趣,并有与媒体评论员加强沟通与管理的意向。我当时建议,可以将管理与服务融为一体,管理就是服务,对于内地优秀的新闻评论员,不妨优先给他们随时约见政府官员的权力。这是国际上通行的方式,也是更好地实现政府与媒体、与社会、民间沟通与谅解的重要桥梁。

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新闻评论将会走在时代、政策的更前沿,将会越来越直接、有力地推动社会的渐进改良与进步。而渐进改良之路,基本上也是古今中外优秀知识分子共同主张的道路。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被狭隘民族主义绑架的《功夫熊猫》

■公民发言

少数人以“电影《功夫熊猫》(以下简称《熊猫》)有文化入侵之嫌”为由,呼吁抵制影片上映。抵制事件近日升级,成都5家影院发出了延期放映的通告,决定在四川地区暂缓上映该片。

(6月21日《新闻晨报》)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话用在抵制《熊猫》事件上最恰当不过了。某部欧美电影该不该抵制或限制,首先应看它是否符合我国广电部门大片引进方面的有关法规,如果符合,它的放映就是无可非议的。《熊猫》能够被列入今年大片引进计划并陆续在各大城市上映,这足以说明它的合法或合规。

在主题思想上,《熊猫》是健康向上的,倡导善胜恶、勇敢、自信等普世价值观,是一部值得青少年暑期一看的励志电影;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洋溢着东方文化智慧——原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可以演绎得如此兴致盎然,为什么不学习美国人的经验,把国产动画片也

拍得很有观赏性呢?这些事实,呼吁抵制的赵半狄先生想必不会不知,他之所以对这样的电影上纲上线到“文化侵略”高度,说白了,就是用狭隘的意识形态挟持社会舆论,进而达到个人的目的:出名。

查阅有关报道,赵先生一路走来都是用国宝熊猫大做噱头,抵制《熊猫》事件可看作是他一以贯之的“行为艺术”的延续,只不过,这次“行为艺术”与艺术无关,只关乎眼球及其背后的名利。而在吸引眼球方面,不得不承认赵先生是名高手——一旦把事情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也就有了道德的制高点。因为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在民族主义范畴,“左”总比“右”来得保险,与其被骂为“汉奸”,不如迎合之,以显示自己的“正确”。成都发出延期放映的通告,可见有关方面微妙的心态。只是,如今越来越多成熟起来的民众懂得用自己的头脑看待、思考问题,而不人云亦云。赵先生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挟持社会舆论的盘算,恐怕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肖风)

盖茨“裸捐”的三重启示

■公民发言

微软创办人盖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表示,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6月22日腾讯网)

“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盖茨的这句话值得回味。

其一,该如何拥有正确的财富观?盖茨还曾说过一句话,名下的巨额财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钢铁巨头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如果能理解这种价值趋向,就会明白盖茨裸捐是在再正常不过的逻辑。其二,该如何对待财富代际转移?曾有学者对江浙富豪做过调查发现:家产越多,越希望孩子接班。应该说,民间财富代际

转移,谁也不宜置喙。但借用盖茨的话说,将财富全部留给子女,肯定不是“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其三,该如何保证善款得到善用?盖茨裸捐,表明了他对基金会的高度信任。我们知道,盖茨夫妇为基金会制定了“15条军规”,为保证善款能用得其所,该基金会明确表示欢迎外部监督,甚至鼓励举报者直接向司法机关检举。这种近乎苛刻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也许囿于国情及心理传统,让富豪悉数放弃财富投身于慈善事业,是一种道德苛责。但在中国慈善家的年龄逐渐老龄化的当下,如何引领包括富豪在内的国人“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如何形成“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的情怀,应是每个人都该思索的命题。(潜山)